

第二章 文獻回顧

首先，回顧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貢獻的理論，以求完整檢視理論發展的脈絡；接著以中國為個案，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實證研究，以釐清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質影響；最後，聚焦本文的核心命題，檢閱既有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實證研究，以作為本文的分析基礎。

第一節 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文獻上，最早可以追溯到Adam Smith於國富論中，強調外商直接投資得以補充地主國資本形成不足的重要性。¹而對此議題的大量探討，則始於1940年代初期。當時，文獻關注的焦點仍集中在對地主國資本形成的貢獻上，但分析的角度及對於資本形成後續效應的見解已略有差異。

直到1960年代，此議題已建構出較具系統性的「缺口理論」；同時，文獻亦擴及技術轉移的面向，強調外溢效果的存在。在理論發展漸趨完整後，除大量學者陸續投入各國的實證研究，用以檢驗或修正理論發展的脈絡外，部分文獻轉而以效率的面向，強調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政經體制變革的貢獻，特別著重於市場機制的引進。

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在發展初期，皆視投資國為填補地主國各方面缺口的必要工具，屬於發展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後，則需從「市場」的面向來理解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其流入起因於地主國市場存在扭曲的狀態，繼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主國資源配置的效率，著重於轉型經濟學的研究。²

1940年代初期，文獻大量關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的重要性，但文獻的分析角度及對於資本後續效應的見解略有不同。Paul N. Rosenstein-Rodan認為，發展中國家由於市場狹小及資本不足所造成的發展障礙，必須由政府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來加以推動，而外商直接投資提供的資本，主要為協助地主國工業的發展；³ Walt Whitman Rostow則強調，地主國透過外商直接投資所取得的外匯，主要用來購置本身無法自給的工業原料及設備，以促進

¹ Adam Smith 著，謝宗林、李華夏譯，《國富論》（台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455-456。

² 羅長源、張軍，〈轉型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經驗〉，《世界經濟文匯》（上海），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頁40。

³ Paul N. Rosenstein-Roda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Vol. 53, No. 210/211, June/September 1943, pp. 202-211.

工業部門的擴張與發展。⁴ 另外，John C. H. Fei與Gustav Ranis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取得資本財所承受痛苦最少的一種方法，從而有助於解決其成長過程中所面臨資源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外資也有助於加速勞動重分配的速度（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就業的問題），協助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成長。⁵

1960年代開始，此議題已建構出較具系統性的理論。理論多強調投資國以其各種形式的優勢，補充或協助發展中國家的不足，進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成長，一般統稱為「缺口理論」。最先被提出的是「儲蓄缺口理論」，該理論主要說明，發展中國家由於勞動生產力及人均收入偏低，導致低儲蓄率，而低儲蓄率限制了國家發展的進程，使經濟成長緩慢。此時，透過外商直接投資，能補充發展中國家目前的儲蓄率與目標所需儲蓄率之間的缺口，以達成經濟成長的計畫與目標；⁶而「外匯缺口理論」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因出口創匯能力不足及外匯偏低所產生的外匯缺口問題，會進而導致儲蓄缺口惡化的現象。外匯的不足，使發展中國家無力進口技術設備及原材料，不僅制約其進出口能力，更阻礙其經濟的成長。因此，透過外商直接投資，補充發展中國家外匯的不足後，便能提升其進出口的能力，進一步促進其經濟的發展。⁷

在「儲蓄缺口」及「外匯缺口」理論的基礎上，Hollis B. Chenery與Alan M. Strout整合既有的架構提出「雙缺口理論」。該理論主要說明，發展中國家以外資來補足其國內資源的短缺（儲蓄及外匯），以達成生產要素的調整與資源有效的配置。特別是外匯缺口較儲蓄缺口大的國家，更需要外資來促進其經濟的成長。因此，短期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地主國擴大出口、增加儲蓄，補充地主國儲蓄與外匯的不足；長期而言，目的在於協助地主國脫離對外資的依賴，達到自我發展的目標。⁸簡而言之，「儲蓄缺口」與「外匯缺口」理論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資本形成貢獻的重要性。而「雙缺口理論」即使論及對地主國生產要素調整及資源配置效率的貢獻，但其先決條件仍是補充儲蓄與外匯「雙缺口」的不足。顯見理論的建構與發展，亦是強調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資本形成的貢獻與重要性。

⁴ Walt Whitman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Norton, 1952). Walt Whitman Rostow 著，林鐘雄譯，《經濟成長過程論》（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頁239-245。

⁵ John C. H. Fei and Gustav Ranis,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Homewood, IL: Richard A. Irwin, Inc, 1964).

⁶ Paul N. Rosenstein-Rodan, "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3, No. 2, May 1961, pp. 107-138.

⁷ Ronald I. McKinnon, "Foreign Exchange Constrai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t Aid Allocation", *Economic Journal*, Vol. 74, No. 294, Jun 1964, pp. 388-409.

⁸ Hollis B. Chenery and Alan M.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4, September 1966, pp. 679-733. 歐陽勛、黃仁德，《國際金融理論與制度》（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頁489-493。

1960 年代末期，文獻探討的重心逐漸轉向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技術轉移的貢獻，主要由於近代經濟成長的本質可視為科技新知不斷累積並加以應用的過程，且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轉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⁹而Sven Ingvar Svenilsson在分析技術轉移的策略時也提到，「迄今最成功的技術轉移案例為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¹⁰ Harry G. Johnson亦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本質是對地主國「一系列」資本、管理能力、技術知識轉移的現象。¹¹另外，在實證研究上，Kiyoshi Kojima分析 1970 年代以後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其發現，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掠奪性較低，投資國與被投資國之間存在緊密的互補關係，而這樣的特質與關係，有助於日本企業對地主國進行技術的轉移。¹²

簡言之，自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文獻的分析與理論的發展漸成系統。文獻的分析從關注資本形成的貢獻而起，接著強調資本形成貢獻所衍伸出的後續效應—有著重於對工業發展的分析、偏重對貿易擴張的論述、說明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就業問題及打破貧困惡性循環的重要性。此外，「缺口理論」的建構強化了既有文獻的分析基礎。而「缺口理論」的發展過程，亦從著重資本的缺口（儲蓄缺口理論、外匯缺口理論及雙缺口模型）逐步發展到強調生產要素缺口及稅收缺口的重要性。在理論發展的同時，技術進步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亦引導文獻逐漸關注技術轉移的面向。至此為止，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貢獻的分析面向已趨於完備。

爾後，部分文獻轉而以效率的面向，強調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地主國政經體制變革的制度效應，特別是市場機制的引進。研究上，以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提供「一整套」的貢獻為分析基礎，從而歸納既有文獻的論點，強調「一整套」貢獻背後所產生的潛移默化效果。Yanrui Wu即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所引進的市場機制，將提升地主國廠商的競爭能力與效率；¹³陳永生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政經體制的變革，具體表現在經濟體制的轉型及法律制度的建立等。¹⁴

⁹ Simon Smith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薛琦，〈技術引進途徑之分析〉，（台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1985 年），頁 1-3。

¹⁰ Sven Ingvar Svenilsson, "The Strategy of transfer" in Daniel L. Spencer and Alexander Woroniak, eds.,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179.

¹¹ Harry G. Johnson, "Survey of Issues", in Peter Drysdale, e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n and the Pacifi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2), p. 2.

¹² Kiyoshi Kojima,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Croom Helm, 1978).

¹³ Yanrui W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9), p. 3.

¹⁴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3 期（2001 年 3 月），頁 21。

另外，對地主國政經體制變革的影響程度，則因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而異，部分外商直接投資甚至對地主國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¹⁵但總體來說，若地主國能善用其相對的優勢與外資達到互補效果，則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將產生互利的正面效應。換言之，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並非皆為成功的案例。也說明引進外資並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市場的規模與特性、合適的外資與產業政策及外資與地主國的相容程度等皆是重要的配合因素。¹⁶

綜合言之，文獻研究的重心，自強調資本形成的重要性，逐步轉移到轉型經濟學及跨國的實證研究。而累積的研究成果得以歸納出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的六項具體貢獻，分別為：以外資協助發展中國家補充儲蓄與外匯缺口的資本形成貢獻；透過外資達到進出口成長並改善貿易結構的國際貿易貢獻；提升地主國產業發展（實體技術與管理技術）的技術轉移貢獻；穩定勞動供需失衡的勞動就業貢獻；增進地主國各項稅賦的財政稅收貢獻；以及推動地主國政經制度轉型的制度變革貢獻。此六項具體貢獻得以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接下來，本文將以此六項具體貢獻為主，逐步探討外商及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貢獻的文獻。以完整的回顧，作為本研究的分析基礎。

¹⁵ Dwight H. Perkins, Steven Radelet, Donald R. Snodgrass, Malcolm Gillis and Michael Roemer,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526-533. Theodore H. Mor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New Policy Agenda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¹⁶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44卷第3期（2001年3月），頁17-42。

第二節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至 2008 年為止，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已經連續 17 年居發展中國家的首位，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本節主要以資本形成、國際貿易、技術轉移、勞動就業、財政稅收及制度變革六個面向，回顧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文獻。

一、資本形成貢獻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外商對中國資本形成貢獻的形式亦不相同。改革開放初期，資本形成不足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透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補充「儲蓄缺口」與「外匯缺口」，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中國外部資金的主要來源。當時，文獻亦視外商為補充中國資金缺口的重要角色。

時至 1990 年代後半期，中國資金短缺的情況逐步改善，文獻關注的焦點亦轉向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配置效率及資本形成質量的貢獻。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貢獻的規模已不是眾所關注的焦點。資本形成的後續效應—資本配置效率及資本形成質量，才是目前值得探討的議題。

文獻上，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配置效率及資本形成質量貢獻的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常見的分析方法為，透過固定資產投資及工業增加值等相關統計數據建立指標，作為資本效率及質量的衡量標準。¹⁷另外，亦有學者透過回歸模型，以固定資產投資為被解釋變數，以外商直接投資及其他相關指標為解釋變數，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影響程度。

在指標的分析上，若將固定資產投資視為投入面指標，將工業增加值視為產出面指標，則既有文獻多單以投入面或產出面的指標做分析。¹⁸但此種分析僅能說明外商做為補充中國資金缺口的角色，惟有同時審視投入面及產出面指標的變化趨勢，才能呈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配置效率及資本形成質量貢獻的分析。陳永生的研究即為綜合投入面及產出面指標所做的分析。其以外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投入面指標—此比重在 1984 年為 1.12%，1999 年為 7.83%；產出面則以外商直接投資工業增加值佔中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指標—此比重在 1984 年為 0.6%，1999 年迅速攀升為 22.49%。¹⁹兩相對

¹⁷ 固定資產投資：由基礎建設投資、更新改造投資、房地產開發投資及其他固定資產投資組成。

¹⁸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1-13。童振源，〈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情勢及對中國經濟發展之貢獻〉，遠景基金會，《中國大陸經濟分析》專題研究（台北），第 2 期（2003 年 8 月），頁 2-3。

¹⁹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3 期

照下，在投入面指標緩步上升的同時，產出面指標卻快速上升。說明外商對中國資本效率與質量的提升做出貢獻。

此外，在回歸模型的分析上，趙晉平透過 1981 年至 1998 年的數據，以固定資產投資為被解釋變數，以中國預算內投資、銀行貸款、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自籌及其他投資為解釋變數，分析外商直接投資是否為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來源。該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將增加 0.13%。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影響程度。²⁰

不論是指標或回歸模型的分析，皆證實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顯著，特別是對中國資本效率與質量的提升。因此，在既有的基礎上，有兩個指標值得做進一步的觀察與分析。第一個指標為，持續觀察外商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及其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有助於瞭解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與趨勢；另一則為，透過建立不同投入面與產出面的指標，以綜合分析的方式，更完整表達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配置效率及資本形成質量的貢獻。

(2001 年 3 月)，頁 29-32。

²⁰ 趙晉平，《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6-61。

表 2-1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江小涓	1991 年-2001 年	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	1991 年至 1994 年快速上升；1995 年至 2001 年逐步下降。
童振源	1993 年-2002 年	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	1993 年至 2002 年，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平均每年為 12.5%。
陳永生	1984 年-1999 年	投入面：外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 產出面：外商工業增加值佔中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	同一期間，外商固定資產投資佔比下降，外商工業增加值佔比上升。顯見外商資本效率與質量同步提升。
趙晉平	1981 年-1998 年	複回歸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將增加 0.1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國際貿易貢獻

一般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國際貿易的貢獻，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的擴張及貿易結構的轉變上。而探討帶動中國貿易規模擴張或貿易結構轉變的主體時，除著重外商所帶來的直接效應外，亦不能忽略中國內資企業因外商直接投資所驅動的間接效應。²¹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規模擴張的貢獻，與比較利益原則下所形成的全球產業分工模式有關。以出口為例，1993 年外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為 917.4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27.5%；2002 年外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提高為 1,699.4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達 52.5%²²。同一期間，加工貿易佔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的比重則一直維持 80% 以上，顯見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多以出口導向的加工貿易業為主。²³

²¹ 柴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內資企業出口績效的影響－基於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北京），2006 年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46。

²² 童振源，〈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情勢及對中國經濟發展之貢獻〉，遠景基金會，《中國大陸經濟分析》專題研究（台北），第 2 期（2003 年 8 月），頁 3。

²³ 宋泓，〈必將消失的特殊性：從投資與貿易視角探析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國際貿易》（北

而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結構轉變的貢獻，可自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演變趨勢看出端倪。1980年代，中國出口貿易結構以初級產品為主，工業製成品次之，服務貿易比重極低；到了1990年代，轉變為以工業製成品為主，服務貿易次之，初級產品最低的出口貿易結構。²⁴特別是，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轉變與外商產業結構的變遷息息相關。

然而，在全球產業分工的發展下，產業內貿易逐漸取代產業間貿易，產業依比較利益原則在各國進行細部的生產與分工。因此，以出口貿易結構的演變趨勢來說明中國貿易結構的轉變，無法深入瞭解產業內部結構的轉變，解釋力稍嫌薄弱。為瞭解製造業內部結構的轉變，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則不失為良好的判斷指標。²⁵根據分析，中國加工貿易產品的增值率，已由1980年代中後期的15%左右，成長到2000年的50%上下，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得以帶動中國製造業貿易結構的轉變。²⁶

此外，在計量模型的分析上，張毓茜藉由1983年至1999年的數據，透過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以中國進出口總額為被解釋變數，前一期中國進出口總額及外商直接投資為解釋變數，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進出口貿易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中國進出口總額將增加1.2654%；²⁷而陳策則藉由2000至2007年的數據，透過時間序列模型（Time Series Model），以中國出口總額為被解釋變數，外商直接投資為解釋變數進行分析。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中國出口總額將增加0.1598%。²⁸因此，計量模型亦證實，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國際貿易產生顯著性的影響。

總的來說，在既有的基礎上，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規模擴張及貿易結構轉變的貢獻，仍有其它值得探討的議題。在貿易規模擴張方面，既有文獻多強調出口擴張的部分，較少探討「兩頭在外」的另外一面，即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進口的貢獻；在貿易結構轉變方面，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同時考量產品進口價值與

京，2003年第1期（2003年1月），頁47-50。

²⁴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44卷第3期（2001年3月），頁34。

²⁵ 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公式： $(\text{加工貿易出口值} - \text{加工貿易進口值}) / \text{加工貿易進口值}$ 。

²⁶ 潘悅，〈在全球化產業鏈條中加速升級換代：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升級狀況分析〉，《中國工業經濟》（北京），2002年第6期（2002年6月），頁19。江小涓，〈從加工組裝向製造基地轉變：外商在華投資進入新階段〉，《國際貿易》（北京），2002年第3期（2002年3月），頁44-47。

²⁷ 張毓茜，〈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文匯》（上海），2001年第3期（2001年3月），頁36。

²⁸ 陳策，〈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2000-2007〉，《社會科學輯刊》（遼寧），2008年第5期（2008年5月），頁123-126。

出口價值，有效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內部結構轉變（升級）的貢獻，因此，不失為估算與衡量的良好指標。

表 2-2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國際貿易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童振源	1993 年-2002 年	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及其佔中國出口總額比重	1993 年，外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為 917.4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 27.5%；2002 年，外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提高為 1,699.4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達 52.5%。
宋泓	1993 年-2002 年	加工貿易佔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的比重	1993 年至 2002 年，加工貿易佔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維持在 80% 以上。
陳永生	1980 年-2000 年	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演變趨勢	1980 年代，中國出口貿易結構以初級產品為主，工業製成品次之，服務貿易比重極低；1990 年代，轉變成以工業製成品為主，服務貿易次之，初級產品最低的出口貿易結構。
潘悅	1985 年-2000 年	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	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由 1980 年代中後期的 15% 左右，成長到 2000 年的 50% 上下。
張毓茜	1983 年-1999 年	普通最小平方法	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進出口貿易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進出口總額將增加 1.2654%。
陳策	2000 年-2007 年	時間序列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貿易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出口總額將增加 0.159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技術轉移貢獻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議題。主要爭論的

焦點在於，外商直接投資是否促進中國工業技術的發展。大部分的文獻皆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惟對技術轉移程度的研究成果不盡相同。

另外，文獻的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一為透過計量模型(以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所設定的回歸模型為主)，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外溢效果是否顯著；另一則以建立或引用各項指標(透過問卷調查或相關單位發佈的數據)，作為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貢獻的標準。

計量模型的分析上，莊奕琦、許碧峰以勞動生產力為被解釋變數，檢測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對中國技術轉移產生正面的貢獻。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比例較高的產業，其勞動生產力愈高，存在顯著的外溢效果。另外，研究亦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低技術差距的產業具有較顯著的外溢效果。²⁹換言之，技術能力較高的中國廠商，較能取得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外溢效果。姚洋則是以總要素生產力為被解釋變數。特別的是，其將外商管理技術納入解釋變數，亦呈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產生正面貢獻的研究成果。³⁰

簡單來說，即使上述計量模型的研究成果不同，但皆證明外溢效果的存在。而研究成果的差異主要導因於採用的模型、變數或研究問題的不同。然而，趙晉平卻認為，技術進步是一個難以直接量化的相對概念。透過總要素生產力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無法具體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的貢獻程度。因此，只能透過建立或引用各項指標來進行間接分析。³¹

在指標的分析上，陳永生透過對比外資企業與中國企業高技術含量設備的擁有數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研究發現，外資企業整體技術水準高於中國企業，且其所呈現的示範效果，勢必對中國企業產生技術外溢的效應。惟整體而言，外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仍有待加強。³²江小涓則以訪談及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研究結果顯示，在 127 家外商企業中，高達 83 家擁有中國未曾使用過的高階技術，而透過技術的外溢效果，外商直接投資得以填補中國的技術空白。³³

綜合言之，即便計量模型分析有其侷限，卻也不難發現，目前透過建立或引

²⁹ 莊奕琦、許碧峰，〈國際貿易、外人直接投資與產業生產力：中國大陸實證研究〉，《經濟論文》(台北)，第 29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221-249。

³⁰ 姚洋，〈非國有經濟成分與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經濟研究》(北京)，1998 年第 12 期(1998 年 12 月)，頁 29-35。

³¹ 趙晉平，《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37。

³²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3 期(2001 年 3 月)，頁 35-36。

³³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49-54。

用指標的間接分析，只能解釋外商的技術水準高於中國企業，對於技術轉移的程度及技術傳遞的機制卻無法提出說明，衡量上難免失之偏頗。因此，重新建立或引用指標適當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程度，及分析技術傳遞的機制，為進一步研究的重點。

表 2-3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莊奕琦	1995 年	複回歸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比例較高的產業，其勞動生產力會提高，顯著存在外溢效果；另外，外商直接投資對低技術差距的產業具有較顯著的外溢效果。
姚樹潔	1979 年-2003 年	複回歸模型	中國的技術進步高達 30% 是由外商直接投資所貢獻。
姚洋	1995 年	複回歸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的管理技術對中國技術轉移產生正面的貢獻。
江錦凡	1982 年-1999 年	複回歸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技術轉移的外溢效果顯著；但實體技術轉移的外溢效果則不顯著。
潘文卿	1995 年-2000 年	追蹤資料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區域技術轉移的外溢效果，中部地區最大，東部次之，西部最小。
陳永生	1995 年	對比外資企業與中國企業高技術含量設備的擁有數量	外資企業整體技術水準高於中國企業，且其所呈現的示範效果，勢必對中國企業產生技術外溢的效應。惟整體而言，外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仍有待加強。
趙晉平	1987 年-1995 年	對比外資企業與中國企業高技術含量設備的進口數量	外資企業高技術含量設備的進口數量遠高於中國企業。因此，推斷外商直接投資促使中國技術進步。
江小涓	2000 年	訪談及問卷調查	127 家外商企業中，高達 83 家擁有中國未曾使用過的高階技術。透過技術的外溢效果，外商直接投資得以填補中國的技術空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勞動就業貢獻

中國為典型勞動力過剩的經濟體，大量剩餘勞動力潛藏於農業部門。因此，透過工業部門及服務業部門的發展，加速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是解決中國農業部門勞動力過剩的根本途徑。³⁴胡祖六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在「珠三角」與「長三角」所創造的工作機會，確實使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及國企下崗職工得以重新就業。³⁵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有助於解決中國農業部門勞動力過剩的問題，為中國勞動就業做出貢獻。

然而，即使外商直接投資是解決中國農業部門勞動力過剩的重要途徑，但學者普遍對其所創造的就業效應持較保留的看法。陳永生分析 1985 年至 1999 年間，外商在中國雇用勞動力的總額與其佔中國勞動就業人口的比重。其認為，整體來說此兩指標皆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但相對於中國龐大的就業人口，外商在中國創造就業機會的效應不高。³⁶

蔡昉、王德文亦認同外商在中國創造就業機會效應不高的看法，但其進一步關注外商直接投資創造就業機會的成長速度。其透過就業成長貢獻率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就業的貢獻。³⁷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成長對中國就業成長的貢獻率，自 1988 年的 1.5% 提高到 2001 年的 18.4%，顯示外商在中國雇用勞動就業人口快速成長的趨勢。³⁸換言之，就業成長貢獻率的快速上升，亦呈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貢獻與日俱增的現象。

³⁴ 趙晉平，《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76。

³⁵ 胡祖六，〈中國引進外資的三大問題〉，《國際經濟評論》（北京），2004 年第 3 期（2004 年 3 月），頁 26。

³⁶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3 期（2001 年 3 月），頁 36-37。

³⁷ 就業成長貢獻率：外商直接投資就業的相對年平均成長率（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成長率與中國總就業人口成長率的比率）與外商直接投資就業佔中國總就業人口比率的乘積。

³⁸ 蔡昉、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資與就業——一個人力資本分析框架〉，《財經論叢》（浙江），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3。

表 2-4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陳永生	1985 年-1999 年	外商在中國雇用勞動力的總額及其佔中國勞動就業人口的比重	整體來說，此兩指標皆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但相對於中國龐大的就業人口，外商在中國創造就業機會的效應不高。
童振源	2002 年	外商在中國雇用勞動力的總額及其佔中國城鎮勞動就業人口的比重	2002 年，外商在中國創造超過 2,350 萬個勞動就業機會，佔中國城鎮勞動就業人口的比重達 11%。
蔡昉	1988 年-2001 年	就業成長貢獻率	就業成長貢獻率自 1988 年的 1.5% 提高到 2001 年的 18.4%，顯示出外商在中國雇用的勞動就業人數成長快速。
王劍	1983 年-2002 年	複回歸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勞動就業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當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就業人口將增加 0.052%；扣除負面效應後，當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就業人口將僅增加 0.00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五、財政稅收貢獻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當外商直接投資一進入中國，就必須向中國各級政府繳納各項相關稅賦，外商對中國財政稅收的貢獻亦應運而生。

研究方法上，簡單分為兩類。一為透過敘述統計的方法，將焦點放在外商直接投資繳納稅賦的總額及其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另一則以推論統計的方法，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的影響程度。

在敘述統計的研究上，童振源估算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的貢獻。估算得出，1993 年外商企業繳納稅賦總額為 226.6 億元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為 5.7%；至 2002 年，外商企業繳納稅賦總額達 3,487 億元人民幣，

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高達 21%。³⁹因此，以稅收總額論，十年來約成長 15 倍；以佔比論，2002 年佔比亦已超過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五分之一，皆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的重要性。

在推論統計的研究上，胡再勇以 1983 年至 2004 年的數據，透過時間序列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整體財政稅收及關稅的貢獻。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整體財政稅收及關稅均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整體財政稅收總額大約增加 0.2848%；而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關稅稅收總額大約增加 0.1348%。⁴⁰

表 2-5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童振源	1993 年-2002 年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繳納稅賦的總額及其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	1993 年，外商企業繳納稅賦 226.6 億元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比重 5.7%；2002 年，外商企業繳納稅賦達 3,487 億元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比重達 21%。
胡再勇	1983 年-2004 年	時間序列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整體財政稅收及關稅均存在正向影響的關係。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整體財政稅收總額大約增加 0.2848%；而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關稅稅收總額大約增加 0.134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六、制度變革貢獻

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制度示範效果，可使地主國產生制度變革的效應，縮短制度變革中的時滯，降低制度變革的成本。⁴¹而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制度變革

³⁹ 童振源，〈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情勢及對中國經濟發展之貢獻〉，遠景基金會，《中國大陸經濟分析》專題研究（台北），第 2 期（2003 年 8 月），頁 3。

⁴⁰ 胡再勇，〈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稅收貢獻及影響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北京），2006 年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82。

⁴¹ 李健，〈轉軌經濟中外商直接投資制度效應的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福建），1999 年第 3 期（1993 年 3 月），頁 35-36。

的貢獻，可簡單區分為政治及經濟制度兩方面的變革，現行文獻則多探討經濟制度的變革。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制度的漸進式改革，自中國實施招商引資的政策開始即產生。而其對中國經濟制度變革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市場化改革及經濟國際化兩方面。在市場化改革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市場機制與競爭機制，帶動中國國有企業與經濟管理體制的變革，提升中國產業的競爭力；在經濟國際化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外向性，帶動中國企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推動中國經濟、法律體制與國際接軌的需求，並進一步引領外商參與中國的產權改革。⁴²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於1992年鄧小平「南巡」及「十四大」召開時正式確立。而市場化體制改革的確立，亦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研究面向的轉變。自此之後，部分研究一改視外商直接投資為補充中國各項「缺口」的研究取向，轉而從「市場」的面向來理解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市場」的概念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起因於地主國市場存在扭曲的狀態，繼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主國資源配置的效率，著重於轉型經濟學的研究。⁴³

⁴² 王洛林、裴長洪、盧聖亮，〈中國外商投資狀況與發展趨勢〉，《財貿經濟》（北京），1997年第10期（1997年10月），頁19。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55-160。

⁴³ 羅長源、張軍，〈轉型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經驗〉，《世界經濟文匯》（上海），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頁40-41。

第三節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本節主要延續上一節文獻回顧的架構，但因未見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制度變革貢獻深入研究的文獻，故本節省略對制度變革貢獻的探討，分別以其他五個面向檢視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文獻。

一、資本形成貢獻

一般來說，研究者通常透過「台商直接投資金額」及「台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兩個指標，衡量台商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

首先，以夏樂生的研究為例，其探討截至 2003 年底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其發現，根據中國商務部發佈的統計數據，以實際直接投資金額計，台商名列中國第四大外資，但若加計台商經第三地（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及香港等）轉投資的規模，則台商名列中國第二大外資，僅次於香港。⁴⁴顯示台商已成為中國資本形成的主要貢獻者之一，其重要性無庸置疑。

其次，高長假設台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全部用於固定資產投資，以台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衡量台商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率。⁴⁵研究顯示，1995 年，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率為 1.32%。⁴⁶另外，童振源以高長的研究為基礎，分析與推估 1999 年的數據。研究顯示，1999 年台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 0.7%，與 1995 年相較，下降幅度頗大。⁴⁷

總的來說，上述研究存在幾個問題。首先，高長估算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金額，是以中國官方所發佈的數據為主。如前述，此仍為低估的數據。而夏樂生加計第三地轉投資的估算方法，得以部分彌補高長數據低估的缺失，求得較為精確的數據，惟其並未進行實際數據的估算。其次，高長假設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金額全部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根據王洛林的估計，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約只將 70% 的投資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此與高長的估計方

⁴⁴ 夏樂生，〈台商赴大陸投資現況及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展望與探索》（台北），第 2 卷第 4 期（2004 年 4 月），頁 29-31。

⁴⁵ 高長推估台商對中國勞動就業、工業產值、財政稅收及國際貿易貢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其一為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資料所做的推估；另一為根據該年台商累計實際投資金額佔該年度中國外商累計實際投資總額的比重，與外商企業對中國經濟之貢獻總額等數據推估而得。該研究的相關數據主要引自《中國統計年鑑》及《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

⁴⁶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139。

⁴⁷ 童振源，〈兩岸經濟全球分工與互賴〉，《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7 卷第 3 期（2001 年 12 月），頁 116-141。童振源，《全球化下的兩岸經濟關係》（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9-60。

法相異。⁴⁸最後，上述研究所估算的時間點，皆與目前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現況不符。因此，本研究將補足近年文獻付之闕如的數據。

表 2-6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高長	1995 年	台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	1995 年，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資本形成的貢獻率為 1.32%。
童振源	1999 年	台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	1999 年，台商固定資產投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 0.7%。
夏樂生	截至 2003 年	台商赴中國直接投資件數、實際使用金額	截至 2003 年底，核准台商赴中國直接投資的件數為 60,186 件，實際使用金額為 364.9 億美元。以實際使用金額計，台商名列中國第四大外資。但若加計第三地轉投資的規模，則台商名列中國第二大外資，僅次於香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國際貿易貢獻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國際貿易貢獻的分析面向，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的擴張及貿易結構的轉變。貿易規模的擴張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總額及其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來衡量；貿易結構的轉變則是以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來衡量。而在台商對中國國際貿易貢獻的文獻上，目前仍集中探討台商對中國貿易規模擴張的貢獻，未見對貿易結構轉變的分析。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規模擴張的研究上，多集中探討台商在中國的出口規模及其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極少涉及進口的部分。以高長的研究為例，其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資料及中國官方發佈的數據，推估 1995 年台商在中國的出口規模。研究發現，1995 年台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達 214.48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 14.4%。⁴⁹另外，童振源以高長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推估 1999 年的出口規模，得出 1999 年台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達 447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 22.9%，與 1995 年相較，乘數為 2.09。⁵⁰

陳麗瑛則根據中國官方發佈的數據推估台商對中國國際貿易的貢獻，並同時

⁴⁸ 王洛林主編，《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 年），頁 4。

⁴⁹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146-148。

⁵⁰ 童振源，〈兩岸經濟全球分工與互賴〉，《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7 卷第 3 期（2001 年 12 月），頁 116-141。

考量進口與出口貿易的規模，但其估算的為台灣對中國國際貿易的貢獻，而非台商對中國國際貿易的貢獻。陳麗瑛的分析顯示，2002 年台灣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為 446.7 億美元，為中國第六大貿易夥伴。但若將香港對中國進出口總額的二分之一視為台灣的轉口貿易，再將日本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的十分之一計為台灣的轉口貿易，加計後 2002 年台灣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總計為 894.66 億美元，台灣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⁵¹

此外，計量模型的研究亦發現，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將擴張兩岸的貿易規模。也就是說，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得以提升台商對中國國際貿易規模的貢獻。李保明、劉震濤以 1989 年至 2002 年的數據，透過複回歸模型，檢驗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與兩岸貿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與兩岸貿易之間呈現正向影響的關係，台商在中國每投資 1 美元，將帶動兩岸貿易年增加 0.646 至 0.713 美元。⁵²

總而言之，上述文獻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首先，高長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抽樣調查資料所推估的出口規模，只統計製造業的部分，無法完整呈現整體台商的貢獻。其次，在貿易規模擴張的貢獻上，高長過於強調出口貿易，而忽略對進口貿易的探討，難以呈現討論的完整性。再其次，陳麗瑛對台灣進出口貿易所做的推估，有重覆計算轉口貿易（香港與日本）的問題。因為，根據中國海關所公佈的「對台灣貿易統計辦法」，說明中國海關對台灣貿易的統計中，已經包括轉口貿易的部分。更重要的是，陳麗瑛以兩岸貿易的總額來說明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研究方法，值得商榷。台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與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以兩岸貿易總額說明的做法，只能表示台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不能說明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最後，上述研究所估算的時間點，皆與目前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現況不符。因此，本研究將補足近年文獻付之闕如的數據。

⁵¹ 陳麗瑛，〈台灣對中國投資現況及影響評估〉，《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10 卷第 3 期（2004 年 12 月），頁 136-143。

⁵² 李保明、劉震濤，〈台商投資的貿易效應與實證分析〉，《經濟科學》（北京），2004 年第 3 期（2004 年 3 月），頁 112。

表 2-7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國際貿易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高長	1995 年	台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及其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	1995 年，台商在中國出口總額達 214.48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 14.4%。
童振源	1999 年	台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及其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	1999 年，台商在中國的出口總額達 447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 22.9%，與 1995 年相較，乘數為 2.09。
陳麗瑛	2002 年	台商直接投資進出口總額、進出口總額年成長率	2002 年，台商在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為 446.7 億美元，佔中國所有外商投資的第六位；加計透過香港與日本的轉口貿易後，台灣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為 894.66 億美元，排序則上升至第三位。另外，2002 年，台商在中國進出口總額的年成長率高達 38.1%，在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獨佔鰲頭。
李保明	1989 年-2002 年	複回歸模型	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與兩岸貿易之間呈現正向影響的關係。台商在中國每投資 1 美元，將帶動兩岸貿易年增加 0.646 至 0.713 美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技術轉移貢獻

探討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除關注實體技術的轉移外，亦不能忽略管理技術的轉移。台商具有語言與文化的優勢，導入生產技術與管理技術的排斥性較低。⁵³因此，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所帶入的生產技術與管理技術，透過勞動力流動或產業關聯效果，擴散至全中國，對中國技術進步及產業升級等產生極大的貢獻。⁵⁴

研究上，文獻多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將範圍直接鎖定在台商的文獻少之又少。不僅未見透過建立或引用指標的分析，以計量模型分析的文獻數量亦偏低。以高長的研究為例，其探討台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時，亦未透過指標或數據進行分析。其歸納既有文獻的研究成果，總結台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通常是伴隨機器設備與技術人員而來，特別是加工技術的轉移效果

⁵³ 傅豐誠，〈1986 年以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地位與角色的演變〉，高希均、李誠、林祖嘉主編，《兩岸經驗 20 年：1986 年以來兩岸的經貿合作與發展》（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 298-300。

⁵⁴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150。

更為顯著。55

計量模型的分析上，楊強、周兼以 1993 年至 2006 年的數據，透過追蹤資料模型，檢定台商透過技術轉移，是否對中國的產業升級做出貢獻。研究結果發現，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的升級皆做出顯著的貢獻，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存在外溢效果。當台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第二產業工業增加值將提高 0.2308%；第三產業工業增加值將提高 0.2679%。⁵⁶然而，此研究主要為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升級的貢獻，技術轉移只能假設為傳遞機制。因此，難以說明外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解釋力不足。

總體來說，如同趙晉平所言，技術轉移是一個難以直接量化的概念，計量模型的分析有其侷限性。然而，建立或引用指標的間接分析，亦僅能解釋外商的技術水準高於中國企業，對於技術轉移的程度及技術傳遞的機制卻無法提出說明，在衡量上亦失之偏頗。（見第二章第二節）也就是說，既有外商對中國技術轉移貢獻的研究方法，亦難適用於台商的研究上。另外，即使以建立或引用指標的方法來衡量台商技術轉移的程度時，又必須面臨數據資料能否取得的問題。總而言之，目前來說進一步的研究有其困難性。因此，本研究不進行台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研究。

表 2-8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高長	1997 年	歸納分析	台商對中國技術轉移的貢獻通常是伴隨機器設備與技術人員而來，特別是加工技術的轉移效果更為顯著。
楊強	1993 年-2006 年	追蹤資料模型	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所具有的先進技術，透過技術轉移，對中國的產業升級做出貢獻。當台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中國第二產業工業增加值將提高 0.2308%；而中國第三產業工業增加值將提高 0.26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勞動就業貢獻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的貢獻可分為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直接效應

⁵⁵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148-149。

⁵⁶ 楊強、周兼，〈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產業結構的影響〉，《當代經濟研究》（吉林），2008 年第 10 期（2008 年 10 月），頁 39。

表現在台商直接投資所創造的就業人口；間接效應則表現在台商直接投資帶動中國內資企業的勞動雇用及提昇中國的人力資本。而目前文獻研究的焦點仍集中在直接效應上，探討台商直接投資所創造的就業人口。

在指標的分析上，文獻多以估計台商製造業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及其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的比重為主。高長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資料及中國官方發佈的數據，估計出 1995 年台商製造業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為 389 萬，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 2.2%。而 389 萬的就業人口中，普通工人約 332 萬人；全職管理人員約 26.7 萬人；全職技術人員約 14.6 萬人；其他則是兼職的管理與技術人員。⁵⁷另外，童振源以高長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推估 1999 年台商製造業所雇用的就業人口。得出台商製造業雇用中國就業人口達 820 萬人，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 3.9%，與 1995 年相較，乘數為 2.09。⁵⁸

此外，在計量模型的分析上，亦顯示台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勞動就業之間呈現正向影響的關係。喻美辭以 1996 年至 2006 年中國 7 個台商產業群聚省市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估計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的貢獻。⁵⁹研究發現，1996 年至 2006 年，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貢獻的效果顯著，當台商直接投資增加 1%，中國就業人口將增加 0.05%。⁶⁰

歸納來說，上述研究存在幾個問題。首先，高長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抽樣調查資料所推估的就業人口，只表示製造業的部分，無法完整呈現整體台商的貢獻。其次，上述研究所估算的時間點，與目前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現況不符。因此，本研究將補足近年文獻付之闕如的數據。

⁵⁷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 (1997 年 5 月)，頁 141-142。

⁵⁸ 童振源，〈兩岸經濟全球分工與互賴〉，《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7 卷第 3 期 (2001 年 12 月)，頁 116-141。

⁵⁹ 喻美辭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選取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規模較多的七個省市。分別為：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北京市及天津市七個省市。

⁶⁰ 喻美辭，〈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對大陸就業的影響—基於大陸 7 個省市面板資料的實證分析〉，《國際經貿探索》(廣東)，第 24 卷第 8 期 (2008 年 8 月)，頁 62-66。

表 2-9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高長	1995 年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及其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比重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為 389 萬，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 2.2%。
童振源	1999 年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及其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的比重	台商製造業雇用中國就業人口達 820 萬人，佔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 3.9%，與 1995 年相較，乘數為 2.09。
喻美辭	1996 年-2006 年	追蹤資料模型	1996 年至 2006 年，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勞動就業貢獻的效果顯著，當台商直接投資增加 1%，中國就業人口將增加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五、財政稅收貢獻

目前，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貢獻的文獻數量偏低。既有文獻關注的面向在於，估計台商直接投資繳納的稅賦總額及其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

高長根據中國官方發佈的相關數據，推估 1994 年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高達 33.75 億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 0.66%。其並認為，隨著台商租稅假期陸續屆滿，未來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可能將大幅提升。⁶¹另外，童振源以高長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推估 1999 年台商繳納稅賦的總額。得出台商在中國繳納稅賦總額高達 70.5 億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 1.7%，與 1995 年相較，乘數為 2.09。⁶²

簡言之，上述研究亦存在幾個問題。首先，高長所推估的數據，來自於中國官方所發佈的統計數據，主要是根據該年台商累計實際投資金額佔該年度中國外商累計實際投資總額的比重估算而得。然而，如前所述，中國官方發佈的台商對中國累計實際投資金額為低估的數據。因此，所推得的財政稅收貢獻應為低估的數據。其次，上述研究所估算的時間點，與目前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現況不符。因此，本研究將補足近年文獻付之闕如的數據。

⁶¹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146。

⁶² 童振源，〈兩岸經濟全球分工與互賴〉，《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7 卷第 3 期（2001 年 12 月），頁 116-141。

表 2-10 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財政稅收的貢獻

文獻	分析期間	研究指標與方法	研究成果
高長	1994 年	台商直接投資繳納稅賦總額及其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	1994 年，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高達 33.75 億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 0.66%。另外，隨著台商租稅假期陸續屆滿，未來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可能將大幅提升。
童振源	1999 年	台商直接投資繳納稅賦總額及其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比重	1999 年，台商在中國繳納稅賦總額高達 70.5 億人民幣，佔中國財政稅收總額 1.7%，與 1995 年相較，乘數為 2.0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四節 小結

自 1940 年代以後，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貢獻的理論發展漸趨完整。文獻研究的重心，自強調資本形成的重要性，逐步轉移到轉型經濟學及跨國的實證研究。轉型經濟學的研究，多以效率的面向切入，強調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地主國政經體制變革的制度效應，提供綜合性的分析架構與研究成果；而實證研究則是以計量模型或統計數據做為工具，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各項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與貢獻。

對中國的研究上，除少數學者從事轉型經濟學的研究外，大部份的文獻都還是以實證研究為主。計量模型的分析，主要是以各種不同的回歸模型，檢定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各項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否產生正向的影響；而統計數據的分析，則以建立或引用各項指標，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各項經濟發展的貢獻。另外，部分研究以統計數據為工具，結合各項指標，從效率的面向，分析對中國各項經濟發展的貢獻。

另一方面，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文獻不多，幾乎以統計數據的分析為主。較具代表性的研究為高長所發表的「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一文。⁶³高長主要探討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並透過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資料及中國官方發佈的數據，推估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高長的研究提供後續研究良好的探討模式與參考基礎，但這篇研究主要的限制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引用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資料及中國官方發佈的數據，使其研究成果產生低估的現象。

除了低估的現象外，過去的文獻還存在其他問題。以國際貿易的研究為例，既有的文獻多強調出口貿易的部分，而忽略進口貿易的貢獻，難以呈現分析的完整性。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並未清楚交代數據的來龍去脈；或者因為研究的標的定義不明，沒有清楚區分是研究台商還是研究台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因而產生研究上的偏誤。再者，在研究範圍上，多數研究還是集中在直接投資金額與出口貿易的分析上，只有極少部分研究提到勞動就業及財政稅收的貢獻。更重要的是，歷年來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的變化很大，許多研究估計的期間距今已遠，特別是高長的研究距今已有 13 年左右，可能與當前的實際狀況差異很大。

此外，過去的研究不僅存在部分問題，而且未見文獻結合各項統計指標，從效率的面向進行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分析。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在

⁶³ 高長，〈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台北），第 3 卷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134-152。

於，目前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相關統計數據不足。所有相關數據中，研究者較容易取得的是中國官方或台灣官方發佈的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金額，至於其他數據則是付之闕如，因此研究者必須先估計出台商對中國各項經濟發展的貢獻後，才能結合這些指標，從效率的面向做進一步的分析。

問題是，許多指標由於相關資料的缺乏，而難以進行估計。以衡量國際貿易效率的指標「加工產品增值率」為例，要計算該比率，就必須先取得「台商加工貿易出口值與進口值」的數據，但由於中國官方並未公佈或甚至並未統計「台商加工貿易出口值」與「台商加工貿易進口值」，因此研究者根本無法計算台商加工產品的增值比率。⁶⁴相同的問題亦出現在「資本形成效率」與「就業成長貢獻率」的計算上，故本研究亦不進行各指標效率面向的分析。

在上一節中，本研究已經剔除制度變革及技術轉移兩個指標，不做進一步的分析；在這一節中，本研究亦說明不進行效率面向的研究。因此，以下各章的分析，主要是從資本形成、國際貿易、勞動就業及財政稅收四個指標，估計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然而，由於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的相關數據資料蒐集不易，因此部分章節在指標的估計與分析上，難免會有所缺漏，無法完整呈現估計與分析的成果。以指標性企業的研究為例，各企業直接投資的金額及繳納稅賦總額的數據，皆不易取得。

⁶⁴ 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公式： $(\text{加工貿易出口值} - \text{加工貿易進口值}) / \text{加工貿易進口值}$ 。